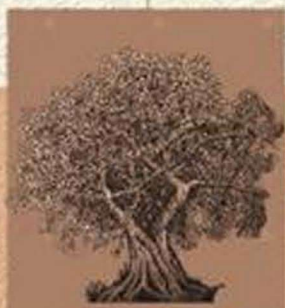


王
卉
◆
著



到达与回归之间

——20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到达与回归之间

——20 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

王卉 著

本研究为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到达”和“回归”之间的二十世纪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10YJC75204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到达与回归之间：20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王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300-17308-5

I. ①到… II. ①王…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20世纪 IV. ①I51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063963号

到达与回归之间——20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

王卉 著

Daoda yu Huigui Zhijian——20 Shiji Houbanqi Yingguo Yimin Xiaoshuojia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 crup. com. cn		
	http:// www. ttrnet. 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85 mm × 260 mm 16开本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张	13.75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8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王卉博士目前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即将推出的这部题为《到达与回归之间——20 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的专著是她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是她刻苦钻研、潜心研究的结果，凝聚着其近五年的心血。这也是她从 2008 年至今的研究工作的积淀。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向她表示祝贺。

近年来，王卉博士一直从事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研究，并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移民的基本格局以及移民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早在 1948 年，约有 700 多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抵达英国，成为英国战后新移民的开端，也开始了英国 20 世纪后期移民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英国社会、思想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这些移民作家也从最初讲述局外人的故事而演变为重新定义其英国性文化身份，并且为重塑英国生活和英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当代英国文坛涌现了“移民三雄”——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和石黑一雄——以及毛翔青、本·奥克利、塞缪尔·塞尔凡、卡里尔·菲利普斯、安德里娅·利维和扎迪·史密斯等一大批颇具影响的小说家。其次，移民作家的频频获奖，不仅改变了当代英国文坛的景观，而且使英国文学的疆域和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姆·莫瑞斯的《开端》和奈保尔的《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分别于 1957 年和 1963 年荣获霍桑登奖，这标志着移民文学开始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此后，英国文坛最具权威的布克奖也对移民作家大加垂青，获奖作家包括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和奥克利等等。再则，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英联邦文学”概念的出现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英国移民文学，从中可以窥见当代英国移民小说家的崛起、自觉的身份构建意识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雄心壮志。

王卉的这部专著以这些富有创作精力和干劲的移民作家为研究对象，立意深刻、视野开阔，擅于运用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概念结合具体文本进行深入的研讨。她在论述中紧紧围绕“流散”这个理论概念，并以其展延的文化内涵与核心议题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当代英国移民作家的流散状态，深入考察其“到达他乡”和“回归故国”的创作主题。整个论述将理论观照和文本分析相结合，较好地阐释了当代英国移民作家作品中纠结的“稍纵即逝的心态”和“永久居留的渴求”等复杂的文学意蕴，研究思路比较清楚。值得肯定的是，王卉并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对英国移民文学中“到达”和“回归”这种踌躇两难境地的讨论，而是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引入到当代英国移民作家的研究，分析其后现代流浪思维，这种提法是比较新颖有趣的，具有开拓性，表现了年轻学者应有的探索精神和学术创新勇气。此外，这部专著也将引起学界对当代英国移民文学更为广泛的关注。

王卉博士是大连外国语学院的青年教师，从事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并始终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期间还赴英国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她勤奋好学、踏

实工作，在完成教育部项目以及在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过程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和阻碍，但她知难而进，勇于探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的成果意味着新的起点。学术道路是漫长的，而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贵在坚持。相信王卉博士会再接再厉，不断有新作问世。

杨金才

2013年1月12日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英国移民作家的发生和发展	5
第一节 孤独的伦敦人——20 世纪 50—60 年代	5
第二节 变形记——20 世纪 70 年代	17
第三节 碎片化和国际化——20 世纪 80 年代	26
第四节 英国的新文学——20 世纪 90 年代	37
第五节 英国移民作家的研究范式	42
第二章 流散	49
第一节 流散——记忆、创伤和身份构建	49
第二节 共同记忆的合唱：《剑桥》和《渡河》中的奴隶制度和救赎	53
第三节 创伤的历史和跨文化移情——《更高的地面》和《血的本质》	66
第四节 后殖民流散诗学与自我建构	74
第三章 到达	85
第一节 到达——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和移民作家的英国化	85
第二节 到达——亚裔英国移民家庭观念的改变	91
第三节 到达——《白牙》中对于重新定义“英国性”的探讨	99
第四节 到达——伦敦族裔图景的改变	106
第五节 到达——英国性的转变	117
第四章 回归	131
第一节 回归——怀旧的情愫和无尽的乡愁	131
第二节 民族思想的回归——《酸甜》中的“正名”思想	139
第三节 民族文学的回归——石黑一雄创作中的日本文学因素	149
第四节 故国的回归——《她脚下的土地》中的摄影及叙事	155
第五章 后现代的救赎	167
第一节 后现代的流浪思维	167
第二节 后现代的身份观——《白牙》中的克里奥尔化思想	171
第三节 后现代的伦理观——《论美》中“美”的伦理意义	180
第四节 后现代的历史观——游离于史实和虚构之间的《一片孤岛》	188
参考文献	199
后 记	212

绪 论

《到达与回归之间——20 世纪后半期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是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到达”和“回归”之间的二十世纪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10YJC752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 2008 年发行华裔美籍作家哈金的新作《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移民作家》与作者此前创作的其他作品不同,是作者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和首部批评文集。《移民作家》包括相对独立但密切相关的三篇论文,它们分别是:《部落代言人》(“Spokesman and the Tribe”)、《背叛的语言》(“Language of Betrayal”)和《个人的家园》(“An Individual’s Homeland”)。

哈金将“移民”(immigrant)的定义进行扩大化界定而认为,但凡从一个国家“移动”或者“被迫移动”到另一个国家的人都能够以此称之,包括流亡者、移居国外者、移居国内者以及逃难者。通过此种归类,作者意欲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移民作家”的生活和工作。“移民作家”并非新名词,各种原因造成的移民、流放以及难民处境从根本来讲都是流离失所的状态,无论是自我放逐、强迫流放或者政治避难,流落在异国土地上的作家都可以称为“移民作家”。这是哈金在《移民作家》中营造的想象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林语堂、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以及昆德拉等著名移民作家在内的想象的共同体。

移民作家的现象也发生在英国。1948 年,三艘载满西印度群岛移民的轮船抵达英国,那些纷纷逃离群岛农村地区的新移民意在躲避经常性的失业和落后的乡村教育,但是他们初来英国时却无法胜任这里的工作。而此时的英国急需劳动力,西印度群岛的新移民们又是如此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因此他们很快寻找到生存的空间。英国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也生存着有色人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充实着英国的文学和文化,但是此次移民运动的规模决定着它将对英国的文学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将英国重塑成为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赋予英国文学以崭新的国际化韵味,从而帮助英国避免在英帝国的陨落之后蜕化为狭隘的英格兰本土主义(Little Englandism)的命运。当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人群都纷纷要求独立的时候,这些精力旺盛、干劲冲天的少数民族却渴望成为英国人。这也很大程度上帮助英国逃脱分崩离析的命运,逐渐被建构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国际主义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抵达之后,这些移民群体和后来的移民作家们能够成为故国的部落代言人吗?《移民作家》中的《部落代言人》主要围绕移民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纠葛展开。早在 1990 年,哈金在其处女作《于无声处》的前言中曾经写道,“我要为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或者被消亡的、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代言”。然而十几年过后,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他坦然承认那时候没有意识到采取这种立场的复杂性和非现实性,作者对自己

早期声称作为“底层代言人”的志向产生怀疑。在公众看来，移民作家的确应该成为“部落代言人”，因为他们肩负着社会责任。但是这些作家本身却要面对究竟能否成为“部落代言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充当这个角色等等诸多的问题。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如何选择，关系到忠诚和生存两方面的问题。哈金在《移民作家》中通过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两位移民作家的经历，阐明自己的观点。林语堂在美国生活 30 年，虽然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凭借自己的艺术创作——《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本跨越时空，实现精神上的回归。在哈金看来，一位具有创作力的作家应有志于成为文化的创作者，而不是介绍人。同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不仅要呈现文化，还要创造文化。这样的作品不仅要让世界了解信息，还要激发读者的情感，让读者了解自身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在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作家必须忠于自己的艺术，因为只有文学能够穿越历史、政治和语言的屏障抵达读者中间，包括作家母国的人民在内。移民作家对于艺术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对立。

林语堂先生部落代言人的角色扮演得成功与否无须后辈妄言，但是英国移民作家代言的旅程却是走得异常艰难。对西方当代文坛有所知晓的读者自然不会忘记那位曾经引发无数的喧嚣和愤怒的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这位流淌着印度血液的英籍作家同时受到以印度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熏染，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孩子》能够超越民族渊源和地理空间，着力反映印度现代社会的生活和历史，使他在西方文坛崭露头角。评论界就此将他与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相提并论。但是该书在印度却遭到查禁，原因是他涉嫌抨击甘地夫人在印度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和孟加拉战争，招致长期执政的国大党英迪拉派的强烈不满。

无独有偶，出生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婆罗门家庭的奈保尔也试图为包括故乡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言。为此他严厉地批判原教旨主义，并且尖锐地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把自身的问题归结为殖民地时期的后遗症，其实它自身道德规范和政府廉洁等问题更加严重。这种形式的代言自然会遭受否定，被当做是对独立后新国家的恶意批评以及对殖民统治的留恋。

即使这样，几乎所有享誉英国的移民作家的作品中都会留有故国的痕迹。卡里尔·菲利普斯和扎迪·史密斯将祖辈父辈们创伤的记忆改写为动人的故事；毛翔青在小说中如数家珍地提到美猴王、糖醋排骨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当这些作家们提笔描绘自己的故国的时候又是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他们在实施自己早有预谋的代言工程，还是情不自禁的情感流露呢？细细的体察和思量之后也许会发现，这些英国移民作家并非执意充当谁的代言，也无法将某个部落或者民族的风俗文化以原生态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他们只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和情感，将故国的记忆和在英国品尝的喜乐悲伤融合起来而已。因此，他们代言的应该是流散的心态和融合的趋势。

之所以谈到“背叛的语言”的问题，是因为哈金将移民作家选择母语还是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视为忠诚和背叛之间的对决。在哈金看来，移民作家最大的背叛莫过于使用外语进行写作，然而移民作家为何要坚持使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呢？哈金认为作家的动机并非如此简单，需要、志向和疏离等因素往往同时交织起来，纳博科夫之所以选择英语进行创作，在于他认为俄语是一种濒临死亡的语言；康拉德之所以使用英语创作的重要原

因在于他梦想成为伟大的作者。的确,移民作家选择使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非但要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更要面临创作过程中生存问题的挑战。但是生存的意义并非仅指形而下的物质温饱,“生存”在于过着有意义的生活,“生存”还意味着充分发挥生命价值和追求梦想。在创作中,纳博科夫与康拉德等移民作家将非母语创作的弊端转变为有利因素,开创出移民文学的传统,成为其他移民作家效仿的榜样。

但是这种榜样和模式并非具体而有形,因此众多的英国移民作家在面对语言选择的时候仍然感到无所适从。塞缪尔·塞尔凡在题为《回到格林纳达》(“Come Back to Grenada”)的散文中透露,面对移民生活的这些独特的故事素材,他起初的时候也是茫然失措,无从着手。但是他忽然意识到,故事的叙述者应该讲纯正的特立尼达英语,而不应该像通常的西印度群岛文学作品那样,叙述部分使用标准的英式英语,而在对话部分使用口语。塞尔凡于是将特立尼达英语和其他形式的黑人英语融合起来,写就首部以黑人英语为主导语言的英语小说,比林顿·奎斯·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在诗歌语言方面的突破提前20多年。塞尔凡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通过创造独特的移民英语的方式反映着有色移民们的风貌,同时宣告文化独立。他将特立尼达卡利普索歌手的辛辣幽默和英国社会喜剧的风格融合出新,从而能够在《孤独的伦敦人》三部曲中将很多联系松散的有趣的故事整合为完整的小说作品,这种创作风格日后被萨尔基、奈保尔和其他后辈延续和改良。因此移民作家使用英语创作,并非要一味地坚持英语固有的传统,他们应该使用合成语言(a language of synthesis)或者克里奥尔化的英语(creolized English)以确保作品更有意义而真实。这种语言使用方式给读者带来特殊的陌生化效果,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英语的传统,形成作者独有的语言风格。在作者语言风格益发独特的同时,英语也从原来的English变为如今的englishes,而这种变化所体现的仍然是融合的趋势。

《移民作家》中谈论“个人的家园”的问题是因为移民作家远离故国,在异国他乡追寻艺术梦想,在抵达的同时,回归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在《个人的家园》中,作者借古希腊诗人卡瓦菲的诗作《伊萨卡》(“Ithaca”)与荷马史诗中“伊萨卡”寓意的不同,对“家园”概念做出重新阐释。在荷马史诗中,伊萨卡作为奥德修斯的家园,是英雄命中注定要回归的地方,重返“伊萨卡”象征着“回归”;而在卡瓦菲的诗中,对于即将踏上旅程的人而言,“伊萨卡”则成为人们理想中的目的地,意味着“抵达”。由此可见,家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和主体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家园由此变得漂浮不定和难以企及。而家园概念的游离和模糊就造成回归的困难,“回归”也不再指称身体层面的重返家园。哈金认为,“回归”是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是否把过去看作自我组成部分的问题。“家园”由此便更多地与“过去”联系起来。同时,哈金更是借助奈保尔的《河湾》重新阐释家园的概念,表明自己对待过去的态度。在他看来,“家园”更多地意味着“抵达”而不是“回归”。

然而更多的英国移民作家面对的是抵达之后的问题和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无法忘记创伤的记忆和坦然面对错位的状态。同时,过去和历史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抵达文学理想的基础。因此,英国移民作家们在异国的生存就如同没有终点的旅行,他们游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忠诚与背叛之间、抵达与回归之间徘徊着,孤独地探索其生存之道。因此,“到达和回归”之间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生

活状态本是来自流散的人生。没有终点的旅途难免会让人感到疲累，所幸的是这些英国移民作家们可以在后现代的哲学思潮中找到些精神的慰藉，因为后现代哲学宣扬的是不确定的原理和流浪者的思维。流浪者指代那些四海为家却无家可归的人们，但是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流浪者也可以指代那些为寻找美好而神圣的家园而坚持探索的人们。祝愿英国移民小说家们能够寻到美好的文学家园和精神归宿。

英国移民作家的发生和发展

第一节 孤独的伦敦人——20 世纪 50—60 年代

英国小说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出生在圣基茨岛，却是在英国工业城市利兹成长和接受教育，因此他认为 20 世纪的宏大叙事是流散和错位，连根拔起的伤痛和重新开始的艰难是整个世纪的主要焦虑。当移动和移民正在悄悄改变很多社会的本来面貌的时候，那些参与移动的群体也同时面对身份和认同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如何应对居住在异国他乡所引发的身份焦虑？如何面对此处彼处都非家的现实？如何应对宿主国的歧视和敌意？

在过去的世纪中，英国文化的面貌因为移民和他们后代的缘故而发生着改变。这些生动而持续的改变进而反映在诸如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毛翔青、本·奥克利、塞缪尔·塞尔凡、卡里尔·菲利普斯、扎迪·史密斯、莫妮卡·阿里、乔治·莱明和哈尼夫·库雷西等作家的作品中。虽然英国的政府和民众对待这些移民并非很友善，虽然消除歧视和实现平等似乎只是神话，但是他们依然生活得生机勃勃。并且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很多最充满生气和最引领潮流的小说作品都出自英国移民作家的手笔。

20 世纪后半期，很多抵达英国的西印度群岛新移民在找到住处和工作之前都是寄居在简陋的青年旅馆中，期间他们逐渐结识来自印度和非洲的移民。正如塞缪尔·塞尔凡（Samuel Selvon）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所描述，他们之后频繁地在家中的起居室聚会，随后色彩鲜明的黑人社区逐渐形成。同时风格各异的爵士乐、加勒比音乐和非洲音乐弥漫于形形色色的俱乐部，所有的音乐风格和音乐家也逐渐开始融合，接着便创作出全新的音乐和文化。新的文化形式通常最先体现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但是特立尼达的卡利普索（calypso）和印度的寓言也同时出现在新兴的英国文学中。

一、英帝国的陨落和新英国的萌芽

20 世纪后半期的新英国文学总体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文风，随后数十年的移民文学中

都会谈到住房问题,声讨英国房东的无礼窥视、势利霸道,谴责英国恶劣的卫生条件,控诉那些禁止房客们一周内多次使用淋浴的规矩和将晚归的人们拒之门外的做法。因此,浴缸、淋浴和大门钥匙的所有权就成为英国当地人和新移民之间文化战争的象征。移民、流亡者和他们的后代将永远感觉无所归属,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是无家可归的。因此,此时的移民文学充斥着回归的渴望,就像奈保尔(V. S. Naipaul)的《黑暗地区:印度亲历》(*An Area of Darkness*)叙写着对祖籍和血统的奢望,但是他随即意识到,昔日永远不能重现,流散的身份永远无法改变。因为印度明确地表示,特立尼达、英属几内亚和非洲东部的印度人是英国的责任,只有那些生在印度的国民才是印度人,而非洲人也必须生长在当地的部落^[1]。对于那些生长在国外,同时又具有强烈种族意识、时刻准备着回归故里的移民来说,这种现实无异于致命的打击。

在英国的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前夕,殖民地社会中就曾经出现作家的群体,他们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有些作为移民或学生来到英国,有些在战争期间曾经捍卫英国,例如布莱斯维特(E. R. Braithwaite)。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作家包括约翰·菲格罗阿(John Figueroa),他1946年在美国取得学位后来英国,在继续接受教育的同时兼任教师的工作。埃德加·密特朗(Edgar Mittelholzer)在1948年来到英国,1952年离开,1956年再次回来。詹姆斯(C. L. R. James, 1901—1989)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数次往返英国,而后在1958年离开英国,回到特立尼达,但是后来又返回英国发表《跨越界限》(*Beyond a Boundary*, 1963)。该小说是反映西印度板球运动中体现的殖民主义、政治立场、心理问题和种族关系的上佳作品。来自巴巴多斯的乔治·莱明(George Lamming)和生于特立尼达的塞缪尔·塞尔凡于1950年同时来到英国。他们同是正当青春,来到英国寻求文学的梦想和逃避殖民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当时英国某些出版社也对殖民地题材情有独钟,因此初来英国的3年之内,塞尔凡和莱明均有作品问世,前者的《明媚的阳光》(*A Brighter Sun*, 1952)和后者的《在我皮肤的城堡中》(*In the Castle of My Skin*, 1953)瞬时成为西印度群岛新文学的佳作和英国黑人文学的先驱。他们的首部作品都是有关西印度群岛的种族和殖民问题,数年之后他们就开始关注西印度群岛移民在英国的生活状况,莱明的《移民》(*The Emigrants*, 1954)和塞尔凡的《孤独的伦敦人》(1956)获得广泛好评。奈保尔在1950年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来到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布莱斯维特在巴巴多斯获得奖学金,来到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而安德鲁·萨尔基(Andrew Salkey)在1952年紧随其后。萨尔基曾经在BBC和学校任职,随后《暴力的属性》(*A Quality of Violence*, 1959)的出版也宣告他创作生涯的开始,同时他也兼任《西印度群岛故事》(*West Indian Stories*, 1960)的编辑。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在1959年来到英国,在随后的1960年就开始在费伯出版社发表作品。这些作家们逐渐形成相识、故交、评论家、记者和出版社顾问的关系网络。萨尔基和安德勒·迪乌齐(Andre Deutsch)往来甚密,并向其推荐奈保尔;同时他也因为和费伯的关系而有机会阅读和推荐威尔逊·哈里斯《孔雀的宫殿》(*Palace of the Peacock*)的手稿。

除前述作家以外,还有很多学者在西印度群岛新文学和英国黑人文学的产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1951年就读牛津大学,在此期间对

[1] King, Bru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

政治产生兴趣,并且参与创立《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后来更名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霍尔推动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向新左派的过渡,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转变为文化研究,由此在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中心享有盛誉。霍尔数十年的创作体现着他对于西印度群岛移民的认同,以及对他们在英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的关注。他认为,对于非洲和加勒比的移民来说,流散的概念是想象中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身份,而非回归故里的渴望。他同时也关注和研究新闻媒介中出现的移民青年的形象,并且意识到随着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实现由防御到创造的转变,新的英国黑人文化也渐趋成熟。

尽管种族主义的羁绊,英国仍将逐渐形成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社会,因为这是英联邦的需要。科芬园(Convent Garden)的非洲中心在1962年非官方地成立,并且用于出品戏剧。非洲和加勒比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热情逐渐蔓延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英帝国也随即被英联邦所代替。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的概念,由此集合前殖民地作家的文学创作。随即出现的各种相关英联邦艺术和文学的文选、艺术节和学术期刊等,帮助散播英联邦文学和概念和扩张其影响。英联邦文学的教学始于利兹大学的英语学院,之后传播到其他高校。利兹大学的教授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连续出版两部颇具影响力的英联邦文学方面专著——《复调的声音:英联邦文学研究》(*A Manifold Voice: Studies in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70)和《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73)。另外,在诺曼·杰弗斯(A. Norman Jeffares)的影响和帮助下,利兹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和《英联邦文学杂志》(*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在1965年创刊。

过去的数十年中,各种文学奖项的获选结果也记录和显示着英国文学的嬗变以及它的多民族和多元化风格的进程。多姆·莫瑞斯(Dom Moraes)的《开端》(*A Beginning*)和奈保尔的《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分获1957年和1963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这标志着移民文学从此荣登英国文坛。

英国文坛最具权威影响的布克奖(Booker Prize)也对前殖民地联邦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获奖的作家作品包括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 1971)、拉什迪的《子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石黑一雄的《去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和奥克利的《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等,获得该奖项提名的包括英籍华裔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 1982, 1986, 1991)和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93)等。1993年,拉什迪的《子夜的孩子》还获得“最佳布克奖小说”(The Booker of Bookers)的殊荣。移民作家的频频获奖帮助改变英国文坛的景观,也使英国文学的疆域和定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该现象与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大学政治和文学市场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同时亦可看出,移民作家群的崛起反映着自觉的身份构建意识和重新定义英国的勃勃雄心。

同时,加勒比艺术家运动(Caribbean Artists Movement)在1966年由约翰·拉罗斯(John La Rose)、安德鲁·萨尔基和布莱斯维特发起,致力于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同时为加勒比文学和艺术赢得更多关注。他们也希望加强与出版界的联系,将加勒比文学置于世

界语境。CAM 运动和拉罗斯等人的作品对于形成黑色英国公民意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很多英国有色公民认为自己从加勒比和非洲等地流放到英国，羁留在异地他乡。拉罗斯认为这些年轻人应该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归属，他们的政治目的应该是在英国取得赖以生存的第三空间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种族问题已然存在，并且呈现继续严重的趋势，因此留居英国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应该迫使当权者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英国的组成部分。同时，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创立黑人文化认同（negritude）的概念作为抵制主流白人文化的武器，并且在诗歌中创造性地运用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政治、黑人历史和黑人意识的融合，将黑人文化认同界定为流散的黑人集体的种族意识。

二、孤独的伦敦人面临的文化冲突

流散者的孤独和他们面临的文化冲突是此阶段小说屡次重复的主题，主要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唯灵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差异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选择。很多优秀的作家选择融合的形式和后现代的中庸立场，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后现代融合的过渡体现在这些作家的创作形式和写作视角中。该时期最具影响的作品当属德萨尼（G.V. Desani）的《关于哈特先生的一切》（*All about Mr. Hatterr: A Gesture*, 1948）。德萨尼 1926 年从肯尼亚来到英国，他以戏仿自传的形式讲述一名穿越印度的朝圣者的故事。这位诙谐幽默的反英雄哈特向很多智者询问生命的意义，最终得出结论为：整个世界往复于善良和邪恶之间。德萨尼在作品中为他亚洲和西方混合血统的角色设计出颇具特色的印度英语，由此在小说的语言和结构中共同体现出融合的特征。作品中的印度英语同时也反映出存在的荒诞性，因为故事中的哈特必须穿梭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虽然该作品在语言和形式上随处体现现代和后现代的实验特色，但是也以融合的方式表现出流散者面临的文化冲突。德萨尼将印度的精神寓言（spiritual allegory）转变为印度风格的英语小说，同时兼具题外话和环环相扣的故事（story within story）等特点。由于其独创的风格和卓著的成绩，德萨尼成为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承认和称颂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很多印裔英语小说家都如候鸟般漂泊游走在多国之间，他们深切地关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然而很多西印度群岛作家倾向定居英国，因此他们同时面临种族歧视、身份迷失和流离失所的问题。非英式的举止被视为怪异、甚至是野蛮；然而移民们英式的举止会引发《模仿者》（*Mimic Men*）的危险。因此，该阶段的移民英语小说通常会关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如何实现生活的过渡以及如何重新塑造和定义英国的问题。

该时期最具影响的西印度群岛作家当属 E.R. 布莱斯维特，他在战争期间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退役后在剑桥大学取得学位。在经历 18 个月失败的求职之后，便在伦敦东区开始自己的从教生涯，同时也为小说《吾爱吾师》（*To Sir, with Love*）搜集素材。如果试图探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在英国是否会遭遇种族歧视，《吾爱吾师》这部描述作者在伦敦从教生涯的自传体小说会提供完美的答案。当布莱斯维特描述自己在电子行业应聘经理职位的时候，读者们便意识到，他在英国获得该行业任职资格的机会非常渺茫。当他向社会底层的英国白人求租住房遭到拒绝之后，英国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便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出现一个令人心酸和发人深省的故事，班级里一个混血黑人男孩的父亲突然离世，全班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奔赴花店，但是

却没有人愿意将买来的鲜花送给那个男孩,因为被发现与“黑鬼”为伍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吾爱吾师》的创作意图在于克服阶级、教育和种族等各方面的歧视;而布莱斯维特作为英国教育系统中的首名黑人教师,肩负着将文明传播到英国荒蛮区域的使命。他的学生们都来自伦敦最臭名昭著的区域中最穷困潦倒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多为失业的移民,居住的地方通常阴暗潮湿、拥挤不堪。学生们多数出口成脏、衣衫褴褛,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技能偏低,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是因为他们存在行为问题。布莱斯维特起初和其他老师同样鄙视这些学生,但是在学生们发现这个黑鬼老师充满仁爱的同时,他也感觉到孩子们的智慧和成熟。并且他发现,如果这些学生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对生活和学习都充满热情。《吾爱吾师》的成功是因为作者含蓄的文风和简练的叙述,布莱斯维特的笔法清晰、简约而充满自信。然而行文中也隐含尖锐的矛盾,似乎严格克己的作者在面对读者时也是欲言又止。同时布莱斯维特也稍嫌过分渲染自己的能力、魅力、睿智、判断和谦和。

《领薪水的仆人》(*Paid Servant*, 1962)讲述布莱斯维特在结束教师生涯之后成为政府儿童福利部门的公务员,以及他如何历尽周折地为黑人儿童寻找住处。《回乡之旅》(*A Kind of Home-coming*, 1962)叙述作者在四个西部非洲国家旅行的经历。随后发表的《稻草的选择》(*A Choice of Straws*, 1967)从流氓阿飞的角度描述居住在伦敦地区的社会底层居民引发和参与的暴力冲突。布莱斯维特以无限的同情和谅解勾画着劳动阶层英国白人的形象。《名誉白人》(*Honorary White*, 1975)以戏谑的口吻叙述作者历时六周的南部非洲之旅,期间他被视作尊贵的客人,受到暂时和有限的欢迎。布莱斯维特未能逃避其他西印度群岛移民颠沛流离的命运,他们时而重返加勒比地区、时而旅居美国或加拿大。他们这些殖民晚期的移民是合法的英国公民,他们自己也一厢情愿地将英国视为永久的居留,但是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却残忍地唤醒他们深藏心底的他者意识。

塞缪尔·塞尔凡、乔治·莱明、安德鲁·萨尔基和奈保尔随后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英国文坛,共同引发轰轰烈烈的西印度群岛文学革命,虽然他们各自见解不同、风格迥异。塞尔凡和奈保尔后来以其卓著的成绩对英国文坛产生持久的影响,而笼罩在他们阴影之中的莱明自然相形见绌。身为作家和编辑的萨尔基虽然著述颇丰,但是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仍然在于他能够明白并且阐明,加勒比的流散者和生长在英国的年轻黑人是如此迥异。该时期的作者和作品通常会表达成年的移民身处异国他乡时感受的焦虑不安,以及他们对千里之外的祖国怀有的深深乡愁。该时期移民小说作品中的主角往往是男性的冒险家,他们奢望金钱、住房和工作,同时也期待浪漫的异国恋情。他们和其他黑人为伍,经常光顾充斥着妓女、毒贩和美国兵的酒吧和俱乐部,与他们有染的白人妇女或贫穷、或放荡。因此,在现阶段的移民小说作品中,生活安逸的黑人中产阶级还未出现,小说的叙述者似乎也意识到非裔美国文学的存在和影响,并且竭力渲染他们不同的经历,而移民妇女小说家的出现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塞缪尔·塞尔凡在1950年抵达英国之前是《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和文学编辑,同时也进行诗歌创作。到达英国之后,他因为发表《明媚的阳光》和《岛屿的世界》(*An Island Is a World*, 1955)而声名远播。两部小说均涉及特立尼达乡村的亚裔印第安人与城市中黑人社区间的关系。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作家对描写家园情有独钟,因为故居和祖国

是他们最为熟知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但是塞尔凡却发现，战后旅居英国的黑人移民的渴望、问题、冒险和语言会提供无限的文学创作素材。

塞尔凡的三部曲反映英国黑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摩西（Moses Aloetta）是小说的主人公。《孤独的伦敦人》的故事在《摩西的攀登之路》中得到延续，并且以《摩西的迁移》为结局。《孤独的伦敦人》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中期，基于一位特立尼达移民口述给塞尔凡的亲身冒险经历。因此该小说并非反映作者本身早期的成功以及在文学界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讲述那些怀揣文学梦想，却堕入社会底层，最终因梦想的幻灭而失望离去的人的故事。

《孤独的伦敦人》的首段以单句话囊括19世纪末期雾气弥漫的伦敦、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们以及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幻想和失落。书中的伦敦阴冷、危险而漠然，但是又仿佛充满天国之城的魅力。小说的语言已经让读者领略到西印度群岛英语的风格，但是书中具体的地点、场景和乘车线路都具有典型的移民时期的伦敦特质，例如向导们在滑铁卢车站（Waterloo Station）接待新到的移民，将他们带到住处，并且帮助他们熟悉新的环境等等。幻想破灭的摩西此时是年轻移民们的向导和牧师。小说主要由发生在摩西生活中的故事构成，涉及特立尼达和非洲的移民。他们遭遇种族歧视、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糟糕的居住条件，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流氓恶棍，慢慢适应和享受都市的生活，甚至学会勾引白人妇女。塞尔凡的优势当属他语言方面的创意、角色的成功塑造、喜剧氛围的营造和敏锐的社会观察。书中描写移民青年们骗财骗色的喜剧场景使得作品超越传统的社会现实主义，而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

书中摩西的名字象征着艰难的朝圣旅途，在经历种种辛苦却有趣的追寻之后，移民们最终没能找到想象中到处都是体面的公共居住环境的、干净整洁的英国。在其他移民青年之前到达英国的摩西成为这些寻梦者的领袖。《孤独的伦敦人》并非单纯讲述移民的故事，还描写到很多乡巴佬闯进现代都市多姿多彩的世界的故事。书中竟有长达10页描写和赞颂海德公园的段落，表达来自穷乡僻壤的移民青年们的快乐和活力。这些年轻一代的移民对他们先辈留居英国的生活倍感兴趣，然而比较之余又对他们逝去的青春年华感到惋惜。虽然他们大肆宣扬“活在当下和融入伟大城市的精彩生活”，但是书中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隐隐的悲伤和忧愁。特别是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当摩西看到那些收入微薄但是却能节衣缩食地在英国买房、安家的移民，他突然感到，自己从流水的年华中所获无几。

塞尔凡在三部曲中第三部《摩西的迁移》的序言中写到，第二部《摩西的攀登之路》旨在描述那个时期的变化——年轻一代的英国黑人以及源源而来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从而为伦敦的场景增添新的色彩。摩西已经升级为房东，他的语言也从地下室飞跃到阁楼，成为古香古色和时尚现代的杂合^[1]。当摩西获得一处即将拆迁的住房三年的租约后，他当即决定将自己荣升为房东。他当之无愧为移民们的前辈，但是却不太懂得年轻移民的生活和习惯。他房屋的地下室很快成为黑色权利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的基地，他也因此被警察逮捕。而后他又差点被他的朋友加拉汉陷害，因为加拉汉想让他蒙冤获刑，从而制造黑人移民在英国遭受虐待的事件。另外的房间被非法走私移民的穆斯林人贩子租住，摩西遭受到走私犯的死亡威胁，被迫参与到他的阴谋中。故事的后来，摩西顶层的阁楼被

[1] Selvon, Samuel. *Moese Migrating*.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3, p.xi.

他的白人男仆鲍勃占领，而鲍勃居住的地下室则转让给布伦达，她是黑豹党的中间分子，总是威胁将摩西的走私行径公布于众。《摩西的攀登之路》可以视作对《鲁滨逊漂流记》和《暴风雨》反讽式的模仿，其中摩西就是普洛斯彼罗—克鲁索，而鲍勃则是卡利班—星期五。

在他们创作生涯的早期，奈保尔和塞尔凡等来自特立尼达的印裔作家都曾经在接受采访中谈到，他们对他者概念的反感。奈保尔早期的作品多为描述特立尼达的文化融合，而塞尔凡的小说则多为倡导种族融合和克里奥尔化的主题，两位作者的小说中都体现出卡利普索歌词特有的反讽风格。读者们会深切体会到，塞尔凡的摩西系列非常类似奈保尔的早期喜剧小说。当看到《摩西的攀登之路》中的作家摩西退休后专心创作自己的传记，读者们自然会将其认定为塞尔凡版本的《模仿者》，因为在奈保尔的版本中，自我流放的特立尼达政治家最后也隐退到英国的旅馆，专注于叙写自己的过去。

当故事中摩西的原型决定回到特立尼达时，塞尔凡便计划续写黑人移民回到故国时可能感受到的忐忑。《摩西的迁移》描写的是摩西在狂欢节的时候回到特立尼达，他的加勒比之行是为缓解英国冬天的阴冷和抑郁，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全部暴露出他模仿者的做派。然而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却因为新颁布的移民法令的缘故被禁止入境，同时他在英国的产业也可能被加拉汉和布伦达低价出售给黑色权利运动，作为他们新的总部。狂欢节的假面舞会、酗酒和性放纵构成该书的背景。摩西选择的面具是画有女王头像的英国硬币，这象征着他在故事中自诩纯正英国公民的荒诞伪装。塞尔凡在作品中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塑造、变化多端的面具设计、多种多样的语气语调以及喜剧元素和反讽的融合都体现出典型的斯威夫特式（Swiftian）的讽刺。此外，故事中还蕴含着对模仿和模仿者的抨击和控诉，因为狂欢节本身就是模仿，而庆祝的参与者就是模仿者。

《孤独的伦敦人》拉开英国黑人小说的序幕，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视为英国移民文学创作的模板。《摩西的迁移》则宣告，西印度群岛男性单枪匹马来到英国寻求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以及冒险刺激的生活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英国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基本平衡，有色移民的家庭渐渐出现，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美式的黑人觉醒也逐渐渗透到英国。黑人女权运动也是影响渐著，塞尔凡在美国出版的《摩西的迁移》的前言中提到，自己因为在作品中描写黑人男性和白人妇女通奸的片段而被某读者当众掴耳光。

1927 年生巴巴多斯的乔治·莱明自幼接受英式教育，1946 年至 1950 年在特立尼达的威尼左拉学院任教，1950 年移居英国。1953 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中》在伦敦出版，很快获得英国乃至欧洲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在美国评论界也引起轰动，由此确立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1955 年莱明因其代表作《在我皮肤的城堡中》而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此后，他先后出版《移民》、《成年与无知》（*Of Age and Innocence*, 1958）、《冒险的季节》（*Season of Adventure*, 1960）、《浆果拌水》（*Water with Berries*, 1971）和《同胞》（*Natives of My Person*, 1972）。这些小说共同建构西印度群岛的历史，显示出殖民主义的永久印记。这些作品以诗化的语言、深奥的内涵和讽喻的方式考察自由的性质以及殖民的枷锁如何扭曲西印度群岛民众的灵魂。1960 年出版的论文集《流放的喜悦》（*The Pleasure of Exile*, 1960）收录他论及加勒比海地区及生活在海外的加勒比海人在后殖民时代的生存状况和感受的文章，从文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追述这段历史发展的过程。